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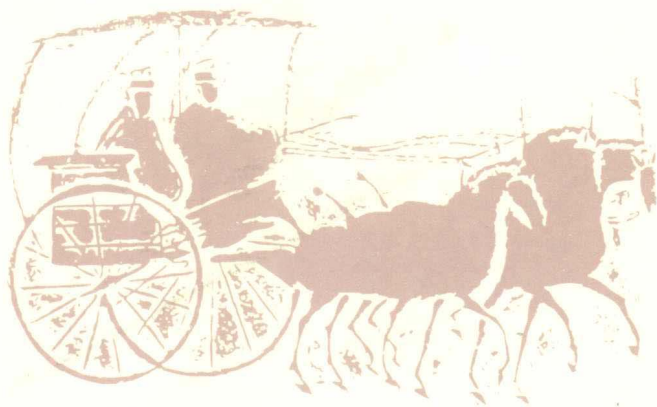
學 統

徐公喜 主編

【清】熊賜履 撰

徐公喜 郭翠麗 點校

理學淵源考辨叢刊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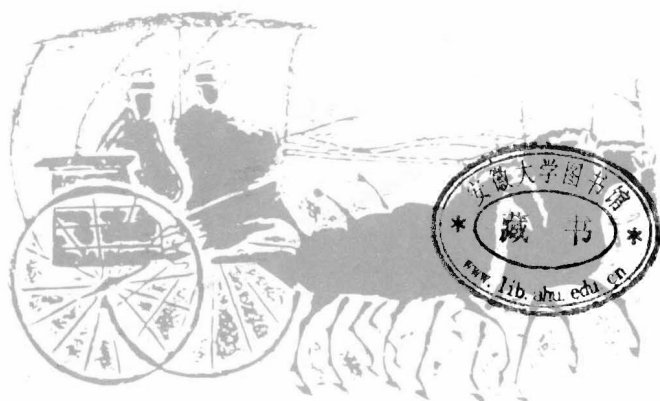
學一統

徐公喜 主編

【清】熊賜履 撰

徐公喜 郭翠麗 點校

理學淵源考辨叢刊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學統 / (清)熊賜履撰 ; 徐公喜, 郭翠麗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1. 6
(理學淵源考辨叢刊)
ISBN 978-7-5506-0539-8

I. ①學… II. ①熊… ②徐… ③郭… III. ①儒家—
研究 IV. ①B22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06582號

書名	學統
著者	(清)熊賜履撰 徐公喜 郭翠麗點校
責任編輯	汪允普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橋北路京新村546號 郵編:210031
開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張	21.625
字數	562千字
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0539-8
定價	76.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8849828)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饒師範學院朱子學研究所招標課題

總序

理學流派衆多，異彩紛呈。歷代學者對前代理學學術作“分其宗旨，別其源流”的工作，始於宋代而盛於明清。從宋到清，理學學術史著述貫通，繼南宋《伊洛淵源錄》、《伊洛正源書》之後，元代有《宋史·道學傳》、《道統圖》；明代有《伊洛淵源續錄》、《閩學源流》諸書；明末至清代，有《元儒考略》、《聖學宗傳》、《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儒林宗派》、《理學宗傳》、《清學案小識》、《北學編》、《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民國初期編纂有《清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與《清儒學案》又合稱《四朝學案》。許多著述源於理學士人強烈的社會危機感、學術危機感和歷史反思意識。從學術層面對社會治亂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和總結，他們得出的一種帶普遍性的結論是天下興亡在人心，人心良莠在學術；要拯救天下、拯救人心，必須明辨學術。李顥就說過：“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理學學案著述大致分爲四個階段，明末清初成爲高峰。

第一階段，南宋時期，是理學史著述起源時期。《伊洛淵源錄》是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所輯理學家傳記匯編，專門敘述理學的源流，成書於乾道九年（1173）。朱熹《伊洛淵源錄》“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刑恕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考。……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四庫全書總目》）朱熹把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及其弟子的行狀、墓誌銘、遺事等傳記資

料，排成理學譜系，並以二程為中心，溯源探流。自《伊洛淵源錄》後，《宋史》特立《道學傳》，由此開理學史著作之先聲。李心傳《道命錄》採用文獻編纂與注文論述相結合的體例，以程頤、朱熹為主綫，記載宋代140年間道學三起三落的興廢歷程。《道命錄序》說：“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為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為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為之，而非（章）惇、京、（秦）檜、（韓）侂（胄）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他又說：“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

第二階段，元至明中期，是理學史著述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有元代《宋史·道學傳》，吳澄《道統圖》；明代有殷奎《道學統緒圖》，謝鐸《伊洛淵源續錄》，明宋端儀撰、薛應旂重修《考亭淵源錄》，林積《續朱子伊洛淵源錄》，朱衡《道南源委錄》，薛甲《心學淵源錄》，陳階《道教淵源錄》，鄔良佐《道學統宗內外二傳》，江尚和《紫陽道脈錄》，金賁亨《道南錄》《台學源流》，劉元卿《諸儒學案》《儒宗考輯略》，王之士《道學考源錄》，楊範《道統言行集》，陳雲渠《浙學譜》，劉長卿《浙學心傳》，王圻《道統考》，馮從吾《元儒考略》和《關學編》，周汝登《聖學宗傳》，徐奮鵬《古今道脈》，魏顯國《儒林全傳》，楊應詔《閩學源流》，劉鱗長《浙學宗傳》，辛全《理學名臣錄》，趙仲全《道學正宗》，劉宗周《聖學宗要》《明道統錄》，程瞳《新安學系錄》等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元儒考略》提要說：“明儒喜爭同異，於宗派尤詳，語錄、學案，動輒災梨，不啻汗牛充棟。”

第三階段，明末清初時期，是“理學學案”著述鼎盛期。主要有孫奇逢《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和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熊賜履《學統》，萬斯同《儒林宗派》，張伯行《伊洛淵源續錄》《道統錄》，此外還有魏裔介《聖學知統錄》、《聖學知統翼錄》，魏一鰲《北學篇》，湯斌《洛學篇》，范鎬鼎《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

《國朝理學備考》，張夏《洛閩淵源錄》，竇克勤《理學正宗》，錢肅潤《道南正學編》，朱寧《尊道集》，汪佑《明儒通考》，王維戊《關學續編本傳》，王心敬《關學編》，朱顯祖《希賢錄》，耿介《中州道學編》，王植《道學淵源錄》，張恒《明儒林錄》等。

第四階段，清朝中後期至民國是理學學術史著述延續時期。清中後期有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唐鑑《國朝學案小識》，劉廷詔《理學宗傳辨正》，羅澤南《姚江學辨》，黃嗣東《道學淵源錄》，成儒《國朝學案備忘錄》，何桂珍《續理學正宗》，王檢心《聖學淵源錄》；另民國有徐世昌《清儒學案》、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等等。

從宋到清，理學史著述除了貫通這一特點外，還形成了以下特點：

1. 體例豐富，各具特色。宋代朱熹作《伊洛淵源錄》，明代劉元卿作《諸儒學案》、馮從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聖學宗傳》，明末清初孫奇逢作《理學宗傳》，反映學派源流，撰寫學者人物傳記，不反映各家各派的學術宗旨，仍然屬於紀傳體史書的範疇。從體裁上看，既有年譜傳記（如《濂溪志》等），也有學案（《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類傳（《理學宗傳》等）、雜考（《元祐黨籍碑考》等）。

2. 內容龐雜，著述繁多。主要有：概括型理學著述，其中正史中的《道學傳》、《儒學傳》等反映各朝各代儒學研究和發展的概況；部分型理學著述，如《諸儒學案》、《聖學宗傳》、《儒林宗派》、《國朝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綜錄型理學著述（分通錄與斷代），如《伊洛淵源錄》、《道南源委》、《元儒考略》、《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理學宗傳》、《清學案小識》、《北學編》、《國朝宋學淵源記》，以及《清儒學案》、《諸儒學案》等；地域型理學著述，如《閩中理學淵源考》、《江西理學考》、《關學編》、《洛學編》，以及《台學統》、《北學錄》、《皖學編》等等；專項型理學著述，如《實學考》、《顏氏學記》等，更是多不勝舉。

3. 學術多元，相互交融。朱陸合流與分異成為主綫，宋以後

學術發展多元化與一元化交融。其中《明儒學案》以王守仁心學發展演變為主綫，全面系統地反映出明代學術發展的全貌。

4. 續修成形，前後相映。如朱熹《伊洛淵源錄》與明代謝鐸《伊洛淵源續錄》、林積《續朱子伊洛淵源錄》、張伯行《伊洛淵源續錄》；明代馮從吾《關學編》與清代王心敬《關學續編》；清朝湯斌《洛學編》和尹會一《洛學編續編》；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與清王梓材、馮雲濠編《宋元學案補遺》；孫奇逢《理學宗傳》與劉廷詔《理學宗傳辨正》等等。

儒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國文化的傳承人。韓愈在《原道》卷十一中，首次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傳授譜系：“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自從朱熹的《伊洛淵源錄》以後，後世以儒學道統為主綫撰述學術史的著作紛紛而出，陶望齡《聖學宗傳》序言稱：“統不一則大寶混於余分，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學。”從《諸儒鳴道集》、李心傳《道命錄》到元代《宋史·道學傳》、吳澄《道統圖》，從明代黎溫《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楊廉《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到清初劉元卿《諸儒學案》、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熊賜履《學統》、張伯行《道統傳》、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以及《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皆有此意。

世人普遍認為“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同目擊其弊，因著此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八《儒林宗派》）闡明了萬斯同編寫《儒林宗派》的宗旨。孫奇逢編著《理學宗傳》時也認為辨聖學、分正統是影響世道盛衰的要事，指出：“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他編有自己的道統承傳譜系，指出：“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

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張夏則認爲：“世之儒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由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尚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蝕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他認爲：“學者居今日而尚論前人，或聞其名未睹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驗本末始終，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張夏：《雒閩源流錄原序》，引自范鎬鼎《理學備考》，清康熙十七年刻本，五經堂藏版）從中反映了宋明道統所遇到的困境。因而恢復與振興道統，可以說成爲宋以來，理學家們一直爲之努力的目標。清王新命《學統》序也指出“然人心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之不端”，指明熊賜履著《學統》就是爲“繼正脉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就理學史著述而言，朱熹《伊洛淵源錄》、萬斯同《儒林宗派》、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張伯行《道統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以及熊賜履《學統》等的成就最爲突出。

《伊洛淵源錄》開創了理學學案史的先例，明、清以來不少學術史著作者沿襲這一體裁。這是朱熹對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由於《明儒學案》本身傳播的影響所及，如今的明代儒學研究，多以黃宗羲《明儒學案》中的選錄作爲治明代儒學思想史的經典和文獻依據，論者又每每取黃宗羲案語，而不及周海門、孫奇逢等，忽略了《聖學宗傳》、《理學宗傳》等的研究價值與歷史地位。然《聖學宗傳》、《理學宗傳》均早於《明儒學案》，周海門的《聖學宗傳》成書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1605），孫奇逢《理學宗傳》比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成書早十年。對於《明儒學案》的學術價值，錢穆先生提出了中

肯意見：“余少年讀黃梨洲《明儒學案》，愛其網羅詳備，條理明晰，認為有明一代之學術史，無過此矣。中年以後，頗亦涉獵各家原集，乃時憾黃氏取捨之未當，並於每一家之學術淵源，及其獨特精神所在，指點未臻確切，乃復時參以門戶之見、意氣之爭。”“故其（梨洲）晚年所為《學案》，亦僅可為治明代儒學者一必要之參考書而止。”（見《讀劉戴山集》，《錢賓四先生全集》（2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351，頁365）指明《明儒學案》不足以作為研究明代儒學最終的文獻依據。

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是我國較早的有特色的系統的學術思想史專著，為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應當認識到《明儒學案》是深受《聖學宗傳》、《理學宗傳》影響的，《明儒學案》之體例是間取《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之形式，就此，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有過評論：“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海門主張禪學，援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疏略。”說明了孫鍾元的《理學宗傳》包含簡述這個學派的源流及宗旨內容，至於“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是否“不以門戶之見”也只是黃宗羲之見而已。

《理學宗傳》將漢代至明末的著名學者分為三類，“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可謂別出手眼”。第一類，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等十一子是理學蔓衍的宗統、主線；第二類，其他各代名儒是理學發展的羽翼、輔綫；第三類，歸於與理學道統相背離的異端。對以上三類學者按人立傳，摘其語錄、著作，然後加以評論，從中探尋理學發展的脈絡、階段和變化規律。

《學統》五十六卷，清朝理學家熊賜履所撰的一部學術史著作。時人謂熊賜履“以王佐之才，為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徐世昌《清儒學案》謂熊賜履曰：“康熙一朝宰輔中，以理學名者，前有柏鄉，後有安溪。孝感則由詞臣致位樞

衡，侍講筵獨久，本朱子正心誠意之說，竭誠啓沃，默契宸衷。聖祖之崇宋學，自孝感發之也。”（《清儒學案》卷三十八《孝感學案》）熊賜履推崇理學，提出“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康熙政要·論君道》）《學統》一書就是“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勿濫”（作者自序）。以正統儒學的觀點系統闡述評判了從先秦至明代各派學術及其代表人物，大體勾勒出了儒家主流：以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九人爲正統；以閔子以下至明羅欽順二十三人爲翼統；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龍等一百七十八人爲附統；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等七人爲雜統；以老、莊、楊、墨、告子及二氏之流爲異統（《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

閩學淵源流長，自有唐歐陽四門倡起，其後海濱四先生相繼，至龜山先生獲“道南”之譽彰明聖學，閩學開始得以正統而居，至朱子而極盛，其後餘波相沿。《閩中理學淵源考》原名《閩中師友淵源考》，九十二卷，清朝李清馥撰。仿前修體例，序學脈布流，上自龜山，下迄明末，博採群書，井然有條。書成，以特例入四庫，足見其爲學界所重，對此，《四庫全書總目》語之甚詳。

清人張伯行在閱讀仇熙所著《道統傳》時，發現仇熙忽略了與儒家道統傳承進程相關的諸多人物，因更爲增輯，上卷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及顏、曾、思、孟。下卷載周、程、張、朱。其《附錄》中則載皋陶、稷、契、益、伊尹、萊朱、傅說、太公、召公、散宜生及楊時、羅從彥、李侗、謝良佐、尹焞。人各一傳，述其言行，而以《總論》冠於卷端。其目的在於一方面使學者更好地理清道統的淵源所在；另一方面可以適應當時朝廷崇儒重道、文教聿興的環境。

學術界對於探討理學淵源的古籍整理呈現出一種零碎化、簡單化的現狀，相關內容多數只是散落或部分出現於各類理學古籍中，這對於欲深刻了解並掌握理學淵源的研究者而言是不便利的，研究思想方法也難以進一步拓展。《理學淵源考辨叢刊》是將周海

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張伯行《道統錄》、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以及熊賜履《學統》輯而爲一。這一課題的設立，一方面可以廓清理學發展的脈絡，多角度地探究理學淵源；另一方面可以爲學者提供除《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經典著作以外的豐富資料，拓寬學者的研究視野，有助於開拓理學、中國哲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領域。

徐公喜

二〇一〇年六月於南山齋

點校說明

《學統》五十六卷，是清朝理學家熊賜履所撰的一部學術史著作。

熊賜履(1635—1709)字青嶽，又字敬修，號素九，別號愚齋，湖廣漢陽府孝感人，世籍南昌。順治六年，賜履學已有成。十五年(1658)中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後又歷任國子監司業、弘文院侍讀、秘書院侍讀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經筵講官、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時人謂其“以王佐之才，爲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熊賜履與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齊名，主要代表著作有《學統》、《閑道錄》、《下學堂劄記》、《經義齋集》、《澡修堂集》、《樸園邇語》、《些餘集》等。徐世昌《清儒學案》謂熊賜履曰：“康熙一朝宰輔中，以理學名者，前有柏鄉，後有安溪。孝感則由詞臣致位樞衡，侍講筵獨久，本朱子正心誠意之說，竭誠啓沃，默契宸衷。聖祖之崇宋學，自孝感發之也。”熊賜履曾建議“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事載《清史稿·熊賜履列傳》、《碑傳集·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公賜履年譜》等。

《學統》一書“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勿濫”(作者自序)。作者以正統儒學的觀點系統闡述評判了從先秦至明代各派學術及其代表人物，大體勾勒出了儒家主流：以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九人爲正統；以閔子以下至明羅欽順二十三人爲翼統；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龍等一百七十八人爲附統；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等七人爲雜統；以老、莊、楊、墨、告子及二氏之流爲異統(《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

是書在《清史稿·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官私書目中均有著錄。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共藏有《學統》14種版本，從內容上看有五十三卷本和五十六卷本兩個系統。五十六卷本與五十三卷本相比，實際上多出文中子、蘇子、陸象山、陳白沙、王陽明五人的傳記。五十三卷本最早的本子是1662年的刻本，有孝感熊氏家藏本和下學堂藏版兩種版本，湖北叢書、叢書集成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都是以五十三卷本做底本。五十六卷本主要有退補齋藏版和下學堂藏版兩種版本，浙江清河坊文元堂刻本、富陽夏震武靈峰精舍本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都是以五十六卷本為底本的。

此次點校，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五十六卷本（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康熙三十四年刻本影印，簡稱“存目本”）為底本，以《續修四庫全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影印，五十三卷本，簡稱“續修本”）和叢書集成初編本（用的是孝感熊氏家藏本，簡稱“叢書本”）為校本進行校讎。主要以標點為主。本書各校本與底本的文字，基本相同，異文不多，為謹慎計，遇有異文，一般僅在校語列出，不改動底本文字，以供讀者參考。這次整理，選錄了諸家序和跋共13篇，其中，富陽夏震武序和高士奇序是底本沒有的，作為附錄附在後面，為讀者提供一些資料。附錄部分，僅加標點，不作校勘。明顯的錯字，如日、曰混淆，己巳巳、戊戌戌不分之類的誤寫誤刻者，徑直改正，不出校記。

點校者：徐公喜、郭翠麗

二〇〇八年五月

王新命序

大道之在古今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共見共由者也。然人心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之不端。如朱、翟爲我、兼愛，鄉愿似德非德，荀卿以禮爲僞，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以及後世聰明才辯之流，假良知以附禪宗，皆足以亂吾學，即足以害吾道。堯、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道統相傳，而必待孔子以集大成。大成之說，孟子亦借作樂以爲喻，乃傳之千古而不易。蓋堯、舜治天下，世遠言湮，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令孔子達而在上，行道濟時，亦止如皋、夔、伊、傅、周、召之事業，何暇以道學之統垂之萬世？俾顏、曾、思、孟見而知之，周、程、朱諸子聞而知之若是哉？此春秋時之不用孔子，殆天之重學統甚於重治統也。

敬修熊先生英年力學，不媿科名。予自承明識先生迄今，垂三十年。見其正色立朝，清忠礪世，時時以泰山仰之，然未獲讀先生之書也。計丙辰之歲，先生憩息林泉，方踰強仕，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恰在斯時。先生居諸就將，日新富有，編成《學統》一書，繼正脉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假先生於此十年中，勞心吐握，晨夕坐論，不過爲皋、夔、伊、周之黼黻贊襄耳。若欲爲萬古明學統，恐亦有志未逮也。今日者聖天子重道崇儒，親幸東魯，移風易俗，以降治化。一德元老再出，而濟蒼生，明體達用，內聖外王，復覩熙皞勳華之盛，是不亦學統而兼治統也哉？

予生也晚，且在蠶叢僻陋之鄉，幼囿於帖括，長從事於簿書，間或涉獵經史。問以統緒，茫無津涯。今先生示以是書，是非判別，邪正井然，如暗室得燈，洪流遇筏，寤初覺而瞽復明也。爰不揣固

陋，而爲之序。

皇清康熙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丑長至日，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右侍郎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潼川侍生王新命譔。

李振裕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天下者存乎治，師天下者存乎學，治與學，後先繩繩轉相屬也。以其有統，其間真偽合離，名實貿亂，皆不可以不辨也。雖然，辨治統易，辨學統難。何也？古之有國者，苟定於一，均謂之正統。間有紫色鼃聲，餘分閏位，一時權勢之所集，天下皆從而尊之，而人莫不知其非正也，故曰易。至於學，則自孔、孟以來，齟齬延延，不絕如綫，而復有異端邪說乘隙而作。此曰道德，彼亦曰道德；此曰仁義，彼亦曰仁義。其爲名也美，而其爲實也隱。雖有智者，孰從而辨之？故曰難也。

澗川先生以王佐之才，爲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及其退而講學於金陵也，以衛道爲己任，崇正黜邪，信從者逾衆。遂以其餘閒著《學統》一書，斷自鄒魯，訖於有明，釐爲五類：曰“正統”，猶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統”，猶小宗也；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族矣。名爲統，而實無統焉者也。嗚乎！一出一入，蓋其嚴哉。三代以下，微言絕而大義乖，“雜”與“異”之害道者不可勝計。然“異”者創爲奇袤，而明樹吾道之敵，夫人而知之也；“雜”者挾持偏僻，而陰竄吾道之中，不必夫人而知之也。故辨學統難，而辨“雜”之戾於正也尤難。

昔子雲擬《易》、仲淹續《經》，論者至比於吳、楚僭王誅絕之罪，蓋亦惡其雜耳。先生深造自得，與考亭之學後先一揆。是書也成，真偽合離，判如黑白。視朱子之《雜學辨》尤精且詳，行其說於天下，人心風俗不大有裨乎？振裕非敢自謂得與於斯文也，幸附桑梓後進之末，以書屬爲序，辭不獲命，遂陳其梗概如此云。

時康熙乙丑季冬，後學吉水李振裕謹書於姑孰冰雪齋。